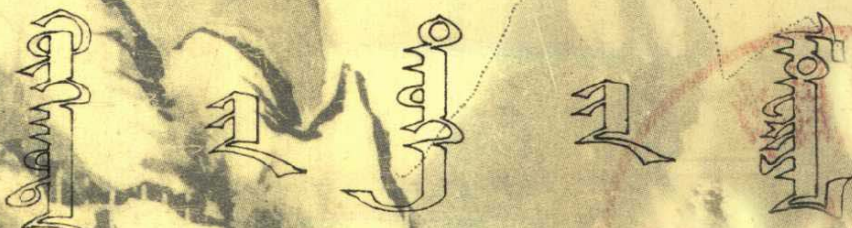


05.01

# 呼和浩特史料



第二集



# 呼和浩特史料

## 第二集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六月

## 呼和浩特史料 第二集

**编辑者**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  
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编修办公室

**正文印刷**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机关印刷厂

**封面印刷**

呼和浩特市印刷厂



# 目 录

|                      |                    |          |         |
|----------------------|--------------------|----------|---------|
| 回忆片断·····            | 奎壁<br>贾堃           | 忆述<br>整理 | ( 1 )   |
| 难忘的岁月·····           | 王建功<br>赵秀梅         | 忆述<br>整理 | ( 5 )   |
| 解放初期萨县工作回忆·····      | 董毅民<br>檀风魁 刘颖      | 忆述<br>整理 | ( 18 )  |
| 重返大青山·····           | 塔拉<br>和文           | 忆述<br>整理 | ( 31 )  |
| 革命引路人·····           | 李景山<br>阿家强         | 忆述<br>整理 | ( 36 )  |
| 解放战争中的一段回忆·····      | 温亮廷<br>李佩华         | 忆述<br>整理 | ( 40 )  |
| 归绥地下工作回忆·····        | 郑朝珍<br>苏丽          | 忆述<br>整理 | ( 46 )  |
| 回忆绥远“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 章叶频                |          | ( 72 )  |
| 反摩擦斗争·····           | 王江琛                |          | ( 81 )  |
| 当八路军去·····           | 云文英                |          | ( 84 )  |
| 绥东斗争回忆·····          | 梁登荣<br>何树          | 忆述<br>整理 | ( 89 )  |
| 回忆解放初期禁烟禁毒工作·····    | 谢希贤<br>何树          | 忆述<br>整理 | ( 94 )  |
| 延安生活琐忆·····          | 李桂茂<br>李守义 王忠民     | 忆述<br>整理 | ( 97 )  |
| 白塔战斗片断·····          | 王 斌                |          | ( 105 ) |
| “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斗争史略      |                    |          |         |
| ·····                | 呼市公安局征史办<br>牛德坤 整理 |          | ( 108 ) |

|                       |                        |
|-----------------------|------------------------|
| 回忆父亲岳浦烈士·····         | 岳钟秀 (152)              |
| 绥远最早的妇女专刊——《新女性》····· | 市妇运史<br>办公室 (155)      |
| 归绥解放前夕二三事·····        | 杨长春 王希舜 (159)          |
| 扎达海河及其两岸的发展与变迁·····   | 刘映元 (165)              |
| 呼和浩特毛纺织工业历史概况(上)      |                        |
| ·····                 | 市纺织局党史办<br>宋联合整理 (189) |
| 绥远电灯公司·····           | 市供电局 (220)             |
| 大有恒地毯作坊·····          | 赵鑫 (226)               |
| 抗战前归绥市的报纸和通讯社·····    | 刘映元 (231)              |
| 绥远新闻社始末·····          | 李丕才 (257)              |
| 归绥沦陷时期的报纸和通讯社·····    | 韩云琴 (267)              |
| 呼和浩特地区音乐文化概况(一)·····  | 邢野 (276)               |
| 康翠玲艺术生涯自述·····        | 舒亚平 整理 (307)           |
| 玉泉区学校史初探(上)·····      | 国柱 (328)               |
| 呼和浩特一中校史·····         |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341)         |
| 接骨世家·····             | 梁文 希舜 (368)            |
| 塞外武豪——吴桐·····         | 李博宏 (381)              |
| 呼和浩特最早的喇嘛庙——大召·····   | 梁天喜 九九 (385)           |
| 大召喇嘛教音乐考·····         | 野草 (399)               |
| 旧城的文庙·····            | 梁士心 (414)              |
| 日伪“搜查本部”纪实·····       | 赵大石 (417)              |
| 历史小资料·····            | (425)                  |



## 回忆片断

奎璧

一九二七年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白云梯一伙反动投机分子公开叛变革命，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向内蒙古的革命同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杀害了李裕智等革命同志，把袖标上的红五星换上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记。我当时正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独立旅任第一营党代表。看到形势恶化，我和营长纪松龄同志商议，决定脱离已经变了质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寻机上蒙古人民共和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在一个晚上，我和营长纪松龄、连长根地及另外四个人脱离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离开伊克昭盟。纪松龄回了察哈尔，我先回到老家保同河。

当时，家乡土默川一带也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有的同志坐了牢，有的同志隐蔽起来。春节后，我们听到吉雅泰等同志隐蔽在

驻防包头的老一团里，就离家上了包头，通过熟人，也住进了老一团，和李森、吉雅泰等见了面。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也常和高布泽博、贾力更、赵诚、勇夫等人相见，彼此交换意见，筹划今后的工作。我在老一团期间，利用平时闲聊的机会向老一团的官兵们做些秘密的宣传工作，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性质、任务，讲少数民族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取得民族的解放。使他们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同情并支持我们进行革命活动。

一九三八年春，我们在包头磴口开了个会，商定以老一团为联络据点，大家分头下乡搞宣传，积蓄力量。按照分工，我回到善岱一带，利用各种关系走村串户，进行革命宣传。这样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都觉得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对今后如何开展工作心里没谱儿，我就和高布泽博、金坤一由老一团出发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找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接受新的指示。

一九二九年春，我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到了包头，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我们组织一批青年民族干部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的指示。经过短期准备，于四月初，我带着贾力更、李森、三德胜、勇夫等人又踏上了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一路上我们忍饥挨饿，费了很大的力气进入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贾力更、勇夫进入了蒙古党务学校，我和李森、三德胜于九月初同从莫斯科回来的乌兰夫、佛鼎一道重返国内，到了归绥。

回到土默川后，我装扮成小贩，端个盘子，贩卖麻糖、炒大豆等食品，活动在善岱一带，以此为掩护，了解情况，接触群众，进行秘密的革命宣传。

一九二九年冬，由于和我同村的曲步霄的告密，我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押往归绥城。曲步霄原先也参加过共产党，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叛变投敌，出卖了不少革命同志，是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叛徒。当他打听到我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来的，就监视我的行动，并向国民党告了密。

按照国民党的法律，政治犯是“两级两审”（即省级初审。

中央复审)。所以我被捕后，就被押到伪绥远省高等法院，由院长于存灏亲自审问。由于敌人没有拿到什么证据，证实不了我的真实身份，所以从初审开始，我就否认我是共产党。敌人问我不是共产党怎么上外蒙去？我就回答说做买卖。当时确实有许多旅蒙商。经过几次审讯，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只好以“共产党最大嫌疑犯”的罪名，判我八个月的徒刑，草草了案。但实际上，从被捕到释放出狱，前后我蹲了两年多的监狱。这种不讲理的事情，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能做得出来。

一九三一年出狱后，我在家住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仍不放心，为了随时监视我的行动，就让我到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办的《民国日报》社里，当《蒙文周报》的校对。最初，我的人身自由受到很大限制，根本没有行动的自由。为了适应新的斗争环境，麻痹敌人，我就尽量少接触人，说话也很谨慎。这样一来，敌人就放松了对我的监视。我就通过李森同志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还几次接待了吉合同志，没出什么意外。后来，我还帮助吉合、刘仁、王逸伦等同志采买货物，解决交通工具，使他们能够顺利地抵达蒙古人民共和国。

一九三三年，我又在土默特高等小学当了教员。尽管在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不能公开宣传革命道理，但我还是利用每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给学生讲革命道理。如在上课时，用桌子、房子的建造来启发学生们的阶级觉悟；课余则象讲闲话似的给学生讲共产党、社会主义。在宣传时，我特别提高警惕，因为监视我的特务经常突然地出现在我身边。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归绥，我的家乡土默川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这时，我离开归绥回到了家乡，和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来的贾力更以及赵诚、勇夫等同志一道，深入土默川的村镇，宣传我党的政策，动员人们起来抗日救亡。同时我们还建立了“抗日救蒙会”，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斗争。

一九三九年春，我奉命上了大青山，和贾力更同志一块担任



“蒙古工委”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我们动员了四十多名蒙古族青年，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学习，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还组织了一支民族抗日武装——蒙古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和八路军互相配合，狠狠打击了日寇和汉奸，使土默川上的抗日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三九年冬，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开始了新的战斗。

（贾 莛 整理）

（奎璧同志原任内蒙古自治区四届政协主席）





## 难忘的岁月

王建功

### (一)

一九二六年秋，我同贾力更、高布泽博等八名同志，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归绥，很快与党的绥远地委接上了关系。当时的绥远地委书记是熊味根，组织部长是路作霖（兼归绥县委书记），宣传部长是杨曙晓（兼团地委书记）。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按照党的指示，与这里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合作，建立了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农民部，麟祥是农民部部长，我和贾力更等是农民部特派员。

接上关系后，根据组织的安排，我们就分头开展工作。贾力

更同志是把什的家，他就回到把什一带做工作；我的老家在兵州亥村（当时的家在归绥城内），我舅舅家在什报气村，我就先到舅舅家落脚，在兵州亥、什报气、牛牛营、忽拉格气、羊根儿、毕克齐一带，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当时，军阀混战给这一带的农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奉军来，晋军退，农民眼看着吃到嘴里的粮食被溃兵糟踏得一干二净。奉军的纪律比晋军更坏，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抢劫掠夺，就是要吃要喝，打人骂人。此时的土匪也多如牛毛。兵抢匪夺，人民终日惶恐不安。再加地主的剥削和反动官吏的欺压，农民再也没法忍受下去了，反抗情绪象干枯的柴禾，见火就着。

一天，我来到牛牛营村，正碰上几个农民在一起唉声叹气，我凑了过去，因为我常来舅舅家，他们都认识我，就向我述说了年景不好，官府逼税，军队要粮，使庄户人没活头的苦楚。我看着一个个布满愁容的面孔，看着这些在穷困中生活、在苦难中挣扎的乡亲，心中充满了对黑暗社会的仇恨。我说：“咱们穷，就是因为有地主的剥削、官府的欺压和兵匪的掠夺，咱们要是抱成一个团，拧成一股绳，和他们斗争，地主就不敢剥削咱们了，官府、土匪也得怕咱们。”听了我的话，他们很高兴，但又担心人心不齐，难以成事。我又讲了南方农民团结起来打土豪的事儿，几个农民激动地说：“咱们也学南方农民的样子，和官匪地主们斗。”

此后，我认识了这个村的旺旺等人，他们看我说话、办事都向着穷人，就慢慢地跟我接近起来了。旺旺从小跟着父亲放牧。后来，牧场逐渐被开垦，生活失去了保障，不得不向汉族地主借债，受尽了地主的欺凌，他恨透了这些剥削人的人。一听到南方出了共产党，专为穷人办事，专打坏人，就经常找我，让我给他讲南方农民打土豪的事儿。我也就经常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依靠他在牛牛营群众中秘密地做些工作。

第二年春天，我联络了两个中学时的同学，在兵州亥办起了

义务小学，以此为掩护，又在兵州亥落了脚。我们白天教小学生上课，晚上办农民夜校，很受农民欢迎。不少因家庭贫困上不起学的青年人，不甘心当睁眼瞎，一听说办起了农民夜校，教识字，又不收钱，就你传我，我传他，来参加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来夜校学习的起初都是年轻人，慢慢地有些老年人也来了。夜校上课时，我教他们认“剥削”、“土豪”、“军阀”、“恶霸”等字，结合本村的实际例子讲解词义。我说：“张云、郑二两家大户，咱们穷人借他一元钱，他每月加利五分，一年就变成了一元六角，这六角钱就是对咱们的剥削。春天农民向他借二斗粮，到秋后得还四斗，我们的二斗粮又被他白白剥夺走了。他家的人一年四季不劳动，就靠咱们劳动过活，这就是剥削，也叫做放高利贷剥削。”他们听得入神，觉得讲的新鲜、在理。

我又举例说：“张云还仗着其保卫团团总的势力，到处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看谁不顺他的意，就抓起来吊打。咱们受了气没地方说理。象张云这样的人就是恶霸。只有把这些人打倒了，咱们穷人才能彻底翻身，过好日子。”

我说的话农民们很爱听，特别是乔茂、冯彦、张和和等，都直接受过张云、郑二的剥削和欺压，对张、郑等恶霸地主恨之入骨。听了我讲的事儿和道理，他们眼里含着泪激动地说：“穷人让他们给害苦了，有他们在，我们就没活头。”

我说：“咱们团结起来和他们斗，就能翻身。”

他们说：“能行吗？”

我说：“能行，有共产党领着我们干，给我们撑腰做主，一定能行。”

他们神秘而兴奋地说：“有共产党给撑腰做主，咱们就拧成一股绳地干！”

此后，我就和他们一块儿在兵州亥秘密地做群众工作，我利用各种机会走村串户，接触贫苦农民，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抱成一团。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兵州亥、什报气、牛牛营、忽拉格气、瓜房子、羊根儿等村培养了一批农协骨干，建立了农民协会小组。不久，就成立了西区农民协会（因这里是归绥城西，所以叫西区）。农协会员扬眉吐气，地主看到势头不对，不敢公开欺负穷人了。这都是党的领导和党的力量在起作用。穷苦农民们私下里议论着这个为穷人当家做主的共产党，暗暗地盼望着共产党快点领导他们翻身解放。

一天夜深人静，我和乔茂两人闲谈，他又问我：“这共产党究竟是咋回事？”乔茂是受地主剥削压迫很深的穷苦农民，他为人老实正直，最恨地主、官府。于是，我就对他说：“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它领导人民打倒地主、恶霸、贪官污吏，推翻欺压人民的反动政府，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建立没有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让全中国的穷苦人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他越听越激动，瞪大两眼说：“这样的党，要我吗？”

我说：“要。入了共产党，反动派抓住要杀头的，你不怕？”

他说：“我不怕。”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考验，我介绍乔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乔茂的劲头更足了。随后，我和乔茂又介绍冯彦、史忠、张和和参加了共产党。党员多了，根据工作需要，就在兵州亥成立了党支部。

牛牛营村的旺旺，自从听到南方出了个共产党，专门领导穷人闹革命的事以后，他说话多了，脸上的愁容也少了，他联络了几个穷苦的蒙汉族兄弟协助我在群众中做秘密工作。旺旺是个忠实、憨厚的蒙古族青年，他渴求解放，盼望翻身，斗争积极。一天，他恳切地对我说：“王先生，你要是认识共产党，给我引荐引荐，我也想参加共产党。”

我对他讲了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共产党员的条件，鼓励他

积极努力，争取入党。不久，经我介绍，旺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什报气村的赵绥恩，和吉雅泰同志是姑表亲，他受吉雅泰同志的影响，参加革命较早。那时，他已经入了党。我俩密切配合，从农协骨干中发展了郝仲义等同志入党，成立了党小组。后来又吸收了毕克齐的郗静淑等同志入党。毕克齐也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是郗静淑，党员有十几个人。这时，根据斗争需要，组织起了中共归绥西区委员会，我任区委书记。

一九二七年初，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绥西农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清丈土地的斗争。斗争先在毕克齐开始，各村相继展开，随后就爆发了震惊华北的“孤魂滩”事件。参加孤魂滩大会的有四、五千人，我在西区发动了五、六百人参加大会。当时我因有别的事没有去。这次反清丈斗争，名义上是国民党区党部组织的，实际上是我们党在暗地里组织和领导的。经过这些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更大了。群众中暗暗议论着：“咱们绥远也有了共产党！”

“共产党要成事呀！”广大穷苦农民盼着共产党早点成事，让穷人翻身过好日子，反动分子却对共产党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到处说共产党的坏话，造共产党的谣。斗争十分激烈，革命形势令人鼓舞。

## (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正当革命形势胜利向前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的大逮捕、大屠杀。

“四·一二”政变的消息传到绥远后，国民党右派纪子明、陈国英等人，很快打出了反动旗帜，于六月份成立“清党委员会”，开始清党。这时，我正在什报气村。什报气村的徐德，是我未婚妻的叔父，清党前是共青团员，清党时叛变，叛变后参加了执行清党任务的纠察队。因我们之间有这个关系，他来告诉我

说：“通缉令上有你的名字，你赶快离开这里。”我当时没来得及安排牛牛营和什报气的工作，只和兵州亥几个同志说了一下，就去包头找路作霖他们。在包头待了三、四天，没找到路作霖他们，我就回家（当时我家住在归绥城三官庙街）隐蔽起来了。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路作霖、熊味根跑了，杨曙晓、李敬、丁钰文、张国林（后叛变）被捕，刘进仁回了河套。领导机关垮了。多数同志坚持革命立场，被迫转移或隐蔽起来，少数不坚定分子倒向了国民党右派，还有的登报申明脱党，说自己年幼无知，受欺骗，误入歧途……。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给农民们带来了灾难。农民协会被取消，地主恶霸又猖狂起来，到处横行霸道，对农民进行恶毒的报复，扬言，“谁用什么办法斗争我，我就用什么办法报复谁。”有的村的地主拿着装满人粪尿的便壶去灌农民。农民们恨透了国民党，暗地里盼望共产党再来。

在白色恐怖中，我和组织断了联系。八月的一天，我在家门口突然看到了杨曙晓同志。我高兴极了，急忙迎上去，问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抬头看了看我家的门牌，又瞅了瞅旁边无人，小声告诉我说：“你到火车站机车厂找汤江汉同志。”说罢，就匆匆地走了。后来我才知道，杨曙晓同志当时被判死刑，他是在等待批复的过程中，越狱逃出来的。此后，我就和汤江汉取得了联系。这里的党员有汤江汉、王贵、晓宏，我们四人组成一个临时党小组，开过几次党小组会。不久，汤江汉同志接到上级指示，要离开这里，让我负责党小组的工作，还交给我一架油印机和一块钢板。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叛变的叛变，脱党的脱党，剩下的党员情况如何，我们也不敢冒失地去找。我们几个人就一边学习，一边分头了解党员的情况。

十月，上级从宁夏派来了李子光同志（化名贾一中），不几天，范建中（后叛变）从河南回来。我们三人对绥远的形势作了分析，决定恢复党的组织，把失散的党员组织起来，继续进行斗

争。我们三人组成了中共绥远特别支部，我任特支书记，李子光任组织委员，范建中任宣传委员。特支成立后，及时和党的顺直省委取得联系，在顺直省委的领导下开始了联络同志、恢复组织的工作。

经过将近五个月的秘密工作，归绥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上组建和恢复起来了。西区的党员除郗静淑脱党外，其余都回到了党组织中。归绥市的党员除叛变和脱党的外，已不到二十人。根据党员分布和工作需要，在归绥城内下设了三个支部：本市城市支部、毛织工人支部和归绥铁路支部。我们还设法同临河支部的刘进仁和包头支部一个姓郭的同志取得联系，这两个支部也由特支领导。

一九二七年十月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奉军统治着绥远，挂着五色旗，实行有党皆杀政策。不仅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就连国民党也处于非法地位，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受到了限制，相对来说我们的活动倒好开展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奉军撤退了，晋军回到绥远，国民党省党部又恢复。我因被通缉过，在当地不好待，就向组织提出到外边去工作，又因顺直省委出了问题，我们和省委失掉了联系，经特支研究，让我出去找关系，相机做些工作。我便通过我哥哥的帮助，经张汉山介绍，到驻察北地区游击军（被国民党收编了的原绥远土匪队伍）司令部当上士文书。并以此为掩护，寻找党的关系。

我出来四、五个月，归绥这边没有一点音讯，心里放心不下，我和部队请了个假，以家中父病为由，回归绥找党的组织。在张家口车站，遇见了李子光。他刚由归绥出来，准备回北京找组织。他问我干什么去？我说：“回去找你们。”他说：“归绥形势很紧，不能回去，回去要出事。我们和上级一直没接上头，我正要去北平找关系，待我找到关系时再回去。”我俩又说了些话就分手了。

一九二九年初，我所在的部队开到安徽亳县，改编为国民党中央骑兵第二师，我在连里当上士。这年二月份，我回归绥找关系，回家不到半个月就被捕了。国民党省党部纠察队草草地提审了我一次，只简单地问了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干什么的，就把我转押到国民党高级法院。我一进法院的看守所，就碰上了李子光。我问他什么时候被捕的， he 说是回到归绥刚下火车，一走进表兄的家门就被捕了。我问他找到关系没有，他说没找到。没几天，范建中也被送来了，他是因诈骗被抓起来的。

范建中是归绥市一个秀才的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平时爱吃好玩，受不了苦，经不起考验。在特支和顺直省委失掉联系后，我和李子光出来找党的关系，范建中就没了主心骨，再加上他父亲的责骂和同学焦子明的拉拢（焦子明当时是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范建中很快叛变了革命。绥远特支及下设的三个支部都被他出卖，包头支部和临河支部他不摸底，没遭破坏。国民党省党部为了破获临河支部，就把范建中派往巴盟临河一带，了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范建中到了后套，以绥远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名义，到处敲诈勒索，贪赃受贿，大吃大喝。没钱花时，就向别人借，后来就骗，因此被人告发，按诈骗犯抓了起来，和我们关在一个屋。我们对范建中，一方面指出他的叛变罪行，讽刺挖苦责骂他，同时给他指出出路，鼓励他以实际行动赎罪，在法庭上不要死咬我们，让他否认原来的供词。范建中知道自己犯了罪，共产党是不会饶他的，对我们提出的条件都一一答应了。法院因问不出我们的口供，就按共产党嫌疑犯结了案，李子光被判刑半年，我被判刑三个月。

李子光同志出来后回了冀东老家，以当小学教员为掩护，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冀东一次大暴动时，他任支队政委，是这次暴动的主要领导人。

一九二九年九月，我从看守所出来，这时绥远连续三年干旱，颗粒未收，卖儿卖女的很多。我家里该卖的卖了，该当的当